

學林

◀ (上接9版)

祖继)为公五十寿诗,记是年事有‘去年捐振治流亡,今年建祠祀贤良’之句,甦民诗注:乡祠有如意斋、北学堂、君子馆、绿胜盒诸胜,则建祠后所名也。如意斋藏赵忠毅铁如意拓本,公集田琬德政碑字为《铁如意颂》。君子馆藏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故名。”可见此事是由隶籍畿辅的清流大佬定议,张之洞主持负责。这在张佩纶光绪五年八月十六日(1879年10月1日)的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其云:“在都时,与李兰荪师、张孝达前辈方营畿辅先贤祠,当作书告之,务慎选司馆之人。”而据许氏所言,他见过张之洞与张佩纶的书信,其中谈得很多的便是购买乡贤书画一事,以备先哲祠收藏展览之用。在王氏所藏信札中,便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第6札提到赵南星“铁如意”的拓本(即《年谱》所提“如意斋藏赵忠毅铁如意拓本”),第12札中的杨继盛书信,此札及第24札同邀赴先哲祠,第29札孙承忠等三位畿辅人物的文献,第30札石珪、石玠兄弟和赵南星的手迹,第43札李化龙的手札(张之洞信中称之为“明万历年间畿辅上等人物”)等,正如张之洞本人在《抱冰堂弟子记》自道“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祀历朝乡贤,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另外如第5札张之洞邀张佩纶到宅中同纂《畿辅先贤录》,第60札催张佩纶提交乡祠纪念文章等。

由上述可知,二张在光绪五年下半年就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贤文献收集的书信讨论往来频密。

不过二张关于畿辅先哲祠一事的往还书信,在已知之外,还有其他信札存世。如在许氏《年谱》中,就录有同时期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另一封短札:“由龙树院诣先哲祠,日晡必到,望即过绿胜盒共话,且看补种竹树已活否也。”绿胜盒便是前揭先哲祠中的景胜,这封短札的文字并未见于《张之洞全集》和王贵忱所藏书札,但其原件今已下落不明。而就笔者目力所及,发现尚有一封信札原件存世,而讨论的内容是关于畿辅先哲祠极为重要的文献。在2012年湖南省博物馆影印出版的馆藏名人手札中,收有多封张之洞手札,其中有一封编者标为“张之洞致仁兄”的书信,而细看便知这位仁兄正是张佩纶。故将原札释读如下:

昨晚因倦慢客,罪甚!(祠联竟忘谈及,荒率昏聩甚矣。)睡至寅初即觉,只可起坐,幸头痛已解,无苦矣。存注感感,今日月朔,必无客来,如惠临,可邈谈也。祠名主字须面罄,袁处钱物事,幸为留意,至祷。曾、李有回报否?敬复幼樵仁兄左右。期之洞顿首。

鄙意谓祠名“先哲”,中竟“圣贤”最妥。若“贤哲”之称,指摘太多,人将谓我护前,可以不必,且与“圣”连文,则“贤”字较尊(专指从祀为义),于旁竟无碍。“贤哲”之“贤”较宽,似旁



左图: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可看作是塑造清流北派共同体的一种行为。
右图:《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录作者曾见诸多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抄件。

兔皆不得为贤矣。此前数日,友人所说,似亦有见,“圣贤”两字,既较自然,且名目宏大,吾乡既有乡圣,即不甘以乡贤小之耳,请裁酌为幸。

因此可知此札与王贵忱所藏畿辅先哲祠一事诸札同时,而据《未刊书札》笺注者林锐考证,可确定同时期张之洞信札未署“期”字者,因当时其继氏王夫人去世,所作时间区间定为光绪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此札张之洞自言是月朔日所作,因此可推断是十月初一或十一月初一日(1879年11月14日或12月13日)。接续前引许同莘《年谱》所记:“称先哲祠者,仿杭州先觉堂例。中竟祀

圣贤,圣谓伯夷叔齐也。时有议称贤哲祠者,公谓贤哲之贤,其义较宽,若中竟称贤哲,则旁兔皆不得为贤矣。说详公致张侍讲书。”故从前后内容比对可知,《年谱》提及的“致张侍讲书”正是这封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信札,二人讨论的是先哲祠和祭祀各兔的名称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前引诸札中出现二张将先哲、先贤等词混用的情况,可知此信作于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定义之前,可惜的是这封信札的流传线索也不能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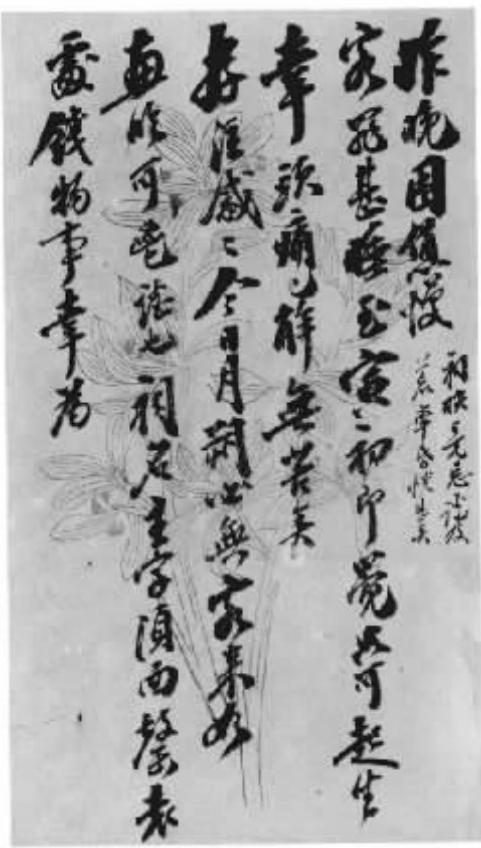
畿辅先哲祠和《畿辅先哲录》是围绕在李鸿藻周围清流北派所倡的雅事,可看作是塑造清流北派共同体的一种行为。有学者的研究中,也曾将此事看作是光绪年间南北清流地域学术分疏的标识。关于清流南北分派的史料和研究甚多,而袭其常说,则在光绪初年当翁同龢为帝师后,二张奔走于李鸿藻门下,攻击沈桂芬和王文韶倾力之时。王文韶是沈桂芬的学生,均为南人,故也互相援引。此所谓清流南北之争,也被视作甲申政潮的源头。但从畿辅先哲祠一事来看,其实当时所谓清流南派首领沈桂芬也参与其中,因沈氏“虽南人而籍隶顺天”,所以有关畿辅地方的祀奉先哲一事也与其相关,且照陈宝琛的说法,沈氏是乐观其成的。此事看似虽小,但可注意的是清流南北派系之分的界限可能未必那么清晰,分派也未必如此板结。

在 前述信札之外,据笔者所见,尚有其他多封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流传的线索。1936年,黄潜

人圣庵摭忆》,其中就记录曾见过诸多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的抄件,均是许同莘为编张之洞年谱从丰润张家抄出。这批张之洞的来信,与王贵忱所藏60余通时间相近而略晚,且更具史料价值,也更可为二张在光绪初年的交往详情作注脚。

《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流传版本甚多,在后来合订出版的几种本子里,有一条笔记被名为“南皮集外书札”(也作“张南皮集外书札节录”),其中共提及20通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信札,抄录了其中19通的文字。查《花随人圣庵摭忆》该则笔记最早刊布于期刊的版本可知,该文1936年3月14日刊于《中央时事周报》第5卷第9期。这19通信札后被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收录,故广为学界所知,但对其流传情况却所知甚少。

据黄潜自道,此则笔记的缘起是:“比承许君溯伊以南皮集外书札见示数通,中盖有极关史料者,度是广雅后人供编谱之资。”许君溯伊就是许同莘,他本人是张之洞幕府的后起之秀,在张氏去世之后,以整理编纂张之洞的遗稿和年谱为职责。另外,在1936年第1期《中央时事周报》的连载笔记中,黄氏就说过已看到李宜龚送来许同莘所编的《张文襄公年谱》初稿,不久后又看到了许氏转抄的张之洞集外书札,所以推测是许氏编谱之用。根据黄潜笔记所提供的线索,笔者在查找许同莘的著作时发现,《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这则笔记,其中关于张之洞信札部分几乎全盘收录了许



在2012年湖南省博物馆影印出版的馆藏名人手札中,收有多封张之洞手札,其中有一封编者标为“张之洞致仁兄”的书信,而细看便知这位仁兄正是张佩纶。